

朱自清任教清华住所笺证 · 清华园外篇

姜朋

赴欧前夕两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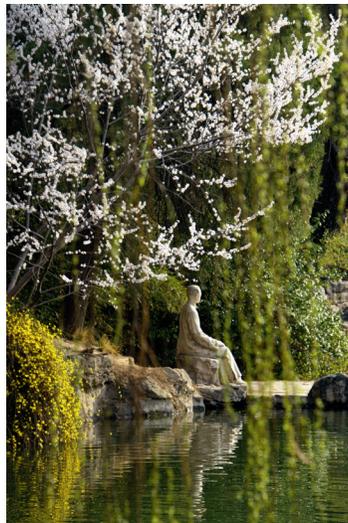
1931年夏天，朱自清与陈竹隐女士订婚，曾在南海租屋小住。据白化文教授回忆：

先母常对我说起一件往事，即，1931年夏季，朱佩弦（自清）先生刚和陈竹隐先生订婚，在中南海租了几间房，过精神恋爱生活。陈先生是我外祖母和我母亲的朋友，她是成都人，负笈于当时的北平艺术学院，是齐白石、傅西园等先生的弟子，在北平的文艺界相当活跃，有时在真光电影院或清华大学礼堂参加诗歌吟唱演出，那可是古雅的玩意儿，但却很受高等教育界人士的欢迎。可是她在北平没有娘家，有时住我姥姥家。订婚时，我们这边还算大媒和女家的人呢。（白化文：《负笈北京大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页）

1931年8月22日，朱自清乘火车离开北平。至天津换卧车。23日早，到沈阳。下午乘南满车，晚上到达长春，换中东铁路三等卧车。24日早晨，抵达哈尔滨，下榻于道里西三道街与新城大街街口西南角的北京旅馆。26日下午登车离哈，经满洲里出国，过境苏联赴欧洲旅行。

仲玉龙《朱自清先生的哈尔滨三日》一文称：

查阅《哈尔滨市志》《哈尔滨俄侨史》《道里区志》，注明：北京旅馆，1922年创办于新城大街174号（今尚志大街212号），是当时哈尔滨一



清华园内的朱自清像（傅瑞学摄）

家较为豪华高档的旅馆，由俄罗斯人经营，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哈尔滨十大旅馆之一。2011年出版的《老街漫步——哈尔滨历史建筑寻踪》（作者阿唐）记述：该处建筑是“原北京饭店，建于1922年，解放后改为军人招待所。”

该文分析称：

哈尔滨的多份史志资料对此处“北京旅馆”演变作了分析，解放后这里成为黑龙江省军区边防军



富连成社资料。左，叶春善手迹。中，1921年启用的富连成社证章（原件直径3.5厘米）。右，富连成社班主、社长、教授、职员合影。右起第三人似为沈秀水。2025年2月2日翻拍于首都博物馆“大师摇篮双甲追忆——纪念富连成社创办120周年特展”。



◀朱自清合影两帧。

上图，朱自清、陈竹隐与陈竹隐结拜姐妹及其夫婿。前排左一陈竹隐。后排左一朱自清。图片来源：《朱自清全集》第十卷，图版2。

下图，1931年8月，中国文学会师生欢送朱自清赴欧洲访学合影留念。前排右一俞平伯，右二朱自清，第二排右二浦江清。图片来源：《〈朱自清〉在清华：〈完整的人格〉纪念朱自清先生专题展览》，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微信公众号2023年4月4日发布。另见《朱自清全集》第四卷，图版4。



城大街。1946年7月7日，经松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建议，更名为尚志大街，以纪念民族英雄赵尚志。

伦敦寓所

到莫斯科北站后，朱自清又换车经波兰去巴黎。9月5日到巴黎，停留三天，于8日赴伦敦。在《英伦杂记·自序》中他写道，“在英国的七个月毕竟是我那旅程中最有意思的一段儿。承柳无忌先生介绍，我能以住到歇卜士太太家去。”其实，住到歇卜士太太家已是1932年的事了。刚到伦敦时，朱自清住的是旅馆。“每星期连早饭，三十二先令，约合中国元三十五元。”9月12日“早移居至七十七号，五先令六丁一日，三十二先令一星期，甚静，但太小耳。”20日，他从米尔斯旅馆（Mill's Hotel）搬到罗宾森夫人出租的公寓里。从日记来看，他在那里住得不太理想。一是屋子不够舒适，11月12日更换过一次房间；二来，更主要的，是跟房东太太、其他租客相处也不够愉快。

1932年1月4日，朱自清搬到了位于伦敦西北郊圣乞来路的歇卜士太太（Mrs. Hibbs）家。1月2日的通信记录了具体的地址：

人服务站，上世纪80年代末，将原建筑屋顶及内部楼层全部拆除改建，只留下一圈外墙，底楼老建筑的结构装饰没变，由原来的三层改为八层，1998年香江宾馆开业，其中部分建筑于2017年租给营口银行道里支行使用。

综上所述，紧邻兆麟公园、位于中央大街与尚志大街交叉口的今香江宾馆的前身就是1922年的北京旅馆。（仲玉龙：《朱自清先生的哈尔滨三日》，载《扬州日报》2020年12月28日A03版）

其实，哈尔滨中央大街基本与尚志大街平行，并无交点。文中所说“香江宾馆”今称香江世纪大酒店，位于道里区西三道街与尚志大街路口。其东侧与兆麟公园，亦即当年的特市公园（后洋）隔尚志大街相对。朱自清到访时，尚志大街称新



北京旅馆旧址今貌。图中中间建筑在原建筑基础上改建、加高。位于道里西三道街与新城大街街口南侧。

Mr. T. T. Chu
364 Finchley Road
London N. W. 3.
England

在1月9日给陈竹隐女士的信中，他写道：

我星期一搬来此地，一切还算安适。房间比从前住的小些，但从前在第四层，现在第三层，楼梯也好些（宽而稳），上下省力多了。又从前屋内时有煤气臭味，现在是没有了。但屋内顶上有两道斜坡，量坡中间及是窗户。在此吃早晚饭，女厨子手段甚好，菜极可口。

此间住客本有一中国人，系清华旧同学，现在到别处旅行去了……

后来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房东太太》，寡居的歇卜士太太，“她原是个阔小姐，从小送到比利时受教育，学法文，学钢琴……结婚时得着她姑母一大笔遗产；靠着这笔遗产，她支持了这个家庭二十多年。”歇卜士先生从剑桥大学毕业，在世时“一心想做诗人，成天在云里雾里。他二十年只在家里待着，偶然教几个学生。”

先于朱自清住在这所公寓里的中国人是柳亚子之子柳无忌。据柳无忌回忆，1931年秋，他和朱自清在伦敦偶遇。当时柳无忌“在耶鲁大学得到学位，还有一年的清华官费，获得留美学生监督处（那时

正值梅贻琦回清华去当校长，由赵元任接任监督）的准许，去欧洲一年，在英、法、德图书馆内探访所藏中国旧小说，第一站是伦敦。”“最好不过的，如能找到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同住，比较热闹，有照应。朱自清的英文会话有困难，我毕竟在美国已住了四年”。

经过一番努力，我们找到一处理想的房屋，在伦敦西北郊附近，那是一座老式的房子。当年它应得是十分漂亮、宽绰的，可是现在却与主人同样的命运。……

希太太出租的两间房子，一间大的正房朝宽阔的芬乞来路，窗户十分清亮。另一间侧房，对着邻近的另一家房屋，稍阴暗，但亦颇舒畅。朱自清虽



朱自清（第二排右2）摄于伦敦

是清华教授，所拿的月费恐怕不见得比我的多，而且他得接济在国内的家人数口。因此，他挑了那间侧房，把正房让给我。我们高兴地在当天搬进去，这样就同住了三四个月。在此期间，我们每天与希太太及小姐同进早餐与晚饭。这是英国租房的惯例，与美国不同；除午饭外，房客餐宿于寄寓的家中，与房东太太保持相当友谊。在这方面，朱自清与我做到了。我喜欢英国丰富的早餐，晚饭更讲究，而希太太的那位爱尔兰女佣兼厨子，菜也做得有味；更何况，希太太虽然家境困难（在她那条街上，住她那样房子的人，普遍是不会把房间出租的），对房客的膳食却从不吝惜，她毕竟是英国上等人家出身的。因此，我们住得好，吃得好，而使朱自清更高兴的是他有机会听讲英文的机会。（柳无忌：《与朱自清同寓伦敦的日子》，载张春田编：《负笈百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这段记述细节颇多。但还要结合朱自清的记述才能勾勒全貌。二人相遇是在1931年10月10日，“上午在查林路口偶遇柳无忌君，大喜。下午请渠晚饭。”朱自清在《房东太太》文中提到圣诞节在房东太太位于芬乞来路的房子里吃大餐的事。后来，房东的老房因抵押期满被卖掉了，朱自清他们也跟着搬到了金树台的新住处。

房间老是空着，太太的积蓄早完了；还只能在房子上打主意，这才抵押了出去。那时自然盼望赎回来，可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情形并不见好。房子终于标卖，而且圣诞节后不久，便卖给一个犹太人了。她想着年头不景气，房子且没人要呢，那知犹太人到底有钱，竟要了去，经理人限期让房。快到期了，她直说来不及。经理人又向法院告诉，法院出传票教她去。她去了，女儿搀扶着；她从来没上过堂，法官说欠钱不让房，是要坐牢的。她又气又怕，几乎昏倒在堂上；结果只得答应了加紧找房。这种种也都是为了女儿，她可一点儿不悔。

……

记得那回这女仆带了男朋友到金树台来，是个失业的工人。当时刚搬了家，好些零碎事正得一个人。太太便让这工人帮帮忙，每天给点钱。

……我们不久也离开英国，房子于是乎空空的。

不过，从歇卜士太太家里退租，不完全是因为要离开英国。在1932年4月29日的信中，朱自清给出了另一个理由：

我又搬家了！熟人见面说“你‘又’搬了！”其实不甚好搬动，只因房东那边来了日本人，我不愿与同桌，因此不得不另觅住处。房东真好极了，临走时她老人家几乎下泪；她不要我付半个礼拜的钱，我再三推辞，总是不行，只好将来买礼物送她。现在住的房子也不坏，但房东只管房子，别的一概不管，连洗脸水都得自己烧。不过此地烧水毫不费力，洋火一擦，煤气一开就行了。

1932年4月14日，朱自清在雷根特公园路118号租到一个房间，也算是实现了他上年12月15日日记里就许下的愿望。5月13日，朱自清一行离开伦敦去巴黎。此后开始在欧洲大陆旅行。7月8日在布林迪西登上康蒂·罗莎号邮轮。“住一号舱第五百四十二号，舱房里很热。”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于31日回到上海。

辗转北平城

1937年7月9日，梅贻琦校长和陈岱孙、蒲薛凤、顾毓琇、庄前鼎等受邀赴庐山参加国是问题的谈话会。10日，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急转梅贻琦，电称“连日市民、学校均镇静。各方安，乞释念。”14日，局面日益恶化，潘、沈二人急电梅贻琦称“和平望绝，战机已迫”，请梅贻琦设法绕道正太路、平绥路返校，应付时变。29日，北平陷落。

7月27日下午，朱自清一家从西郊搬到了西单牌楼左近胡同里朋友的屋子里（《北平沦陷那一天》）。此后一直在城里找房子。

8月14日，“看东斜街房子，甚好，惟远些。”

17日，“进城。把书与家具运到该死的新居。”[该新居即前述位于东斜街的房子。]

20日，“看房二所，其一甚好。”

21日，“到米黄胡同看房子，甚豪华。房主系瞿兑之先生。房客朱希亮先生将迁居亲戚处。朱先生很坦率。每月房租四十五元。”

22日，“上午定米黄胡同住房。访瞿先生，定租金为五十五元（包括房税）。退陈家房，多付予半月租金。”

24日，“下午至羊尾巴胡同商谈租金。王无理，致余动气，非常不快”。

27日，“孙太太给妻来电话谓明晨可以去看另一处房子。她说租金仅三十五元。”

28日，“看另一所房，决定租用……房东代理人来，许予半月租金，并为王使男辩护。”

29日，“看新房并决定如何分配。”

30日，“把家具及书搬进新居。”[《朱自清年谱》称，此新居位于米黄胡同。与孙国华同寓。]

31日，“移至新居。”

9月2日，“为搬家与妻至学校整理家具。”

4日，“搬家具。”

但也只住了半个多月，朱自清就动身南下了。

长沙·昆明·成都·重庆

1937年9月20日，朱自清“忙于整理行李。”22日到天津。25日到塘沽。28日乘船抵青岛。30日早八点乘火车至济南，晚十一时至徐州。10月2日抵汉口。4日乘火车抵达长沙，寓小吴门外韭菜园一号圣经书院。12月15日，迁居山下原中央研究院占用的宿舍，与柳无忌、罗皓岚、浦江清同屋。1938年2月16日，乘汽车从南岳赴昆明。在昆明待了半个月，4月初去蒙自。8月，随学校回到昆明。1939年2月5、6日，朱自清在昆明青云街的住所写下《蒙自杂记》。其中提到“我在蒙自住过五个月，我的家也在那里住过两个月。”

据陈岱孙老回忆：

长沙临大在长沙只存在一学期，1938年春，又匆匆迁往昆明。培源先生一家是走去香港搭船经越南之海防，再转由河内经滇越铁路到昆明的。我则与朱自清先生、冯友兰先生等十几人走公路，经广西，出镇南关（今称友谊关）到河内，再由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的。我和朱自清先生在河内因事耽搁好几天，到昆明时，培源先生一家和任之恭先生一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朱自清皮制衣箱和眼镜。图片来源：《万里南渡的朱自清衣箱——国家一级文物的烽火记忆》（王军），“中国现代文学馆”微信公众号2025年2月27日发布。《中国现代文学馆40周年馆庆倒计时——“让文物活起来”：朱自清衣箱》，“中国现代文学馆”微信公众号2025年2月28日发布。

已合赁滇池东侧一私人别墅居住。虽交通不便，但环境十分优美。

1938年8月，西南联大文、法两学院，在蒙自上完第一学期后奉命搬回昆明。当时昆明多数专科学校，因避免空袭干扰，都已于是年春陆续疏散下乡开学。西南联大得以借赁这些学校的校舍暂供理学院春季始作教室和宿舍之用，并以之暂供安顿从蒙自搬来的师生居住之用。金先生被安顿在昆明城西北城乡区的昆华师范学校，我则被安顿在昆华师范学校北面二三百[米]外昆华农业学校。联大在昆师借赁的宿舍楼有三栋。南、北二楼为学生宿舍，二楼中间的中楼住了部分的联大教职员。1938年9月28日，昆明受到敌人飞机在云南的第一次空袭。这次空袭被炸的地区恰是昆师所在的西北城乡区。（陈岱孙：《忆念周培源先生》，载刘昉编：《往事偶记》，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那宿舍原是云南都督唐继尧祝寿戏楼的一个包厢，学校为开办航空研究所而租用的。

在1939年8月20日日记中，朱自清写道：“房主勉强同意租期延至十五日。”9月13日日记载：“搬往梨园村。共用七个牛车合五个搬运工。因汽车挡路致延长五小时。”

当时，昆明物价高昂，生活艰难。朱自清在1939年10月14日日记中写道：“想举家迁到四川去，妻抱怨云南的物价不断上涨。”1940年，援引西南联合大学教师带薪“轮休”制度，朱自清申请从这一年夏至1941年夏休假研究。8月4日，到达成都。朱家租住在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内旁院的三间小瓦房里。叶圣陶曾称之为“望江楼对面朱先生的寓所”。在《近怀示圣陶》诗中，朱自清也提到了这三间屋子：

山崩溟海沸，玄黄战大宇。健儿死国事，头颅掷不数。弦诵幸未绝，竖儒犹仰俯。累迁来锦城，萧然始环堵。索米米如珠，敝衣余几缕。老父沦陷中，

残烛风前舞。儿女七八辈，东西不相睹。众口争嗷嗷，娇婴犹在乳。百物价如狂，【足匡】躓孰能主？不忧食无肉，亦有菜园肚。不忧出无车，亦有健步武。只恐无米炊，万念日旁午。况复三间屋，蹙如口鼻聚。有声岂能聒，有影岂能瞽？妇稚逐鸡狗，攫人入网罟。况复地有毛，卑湿丛病蛊。终岁闻呻吟，心裂脑为豷。赣鄂频捷音，今年驱丑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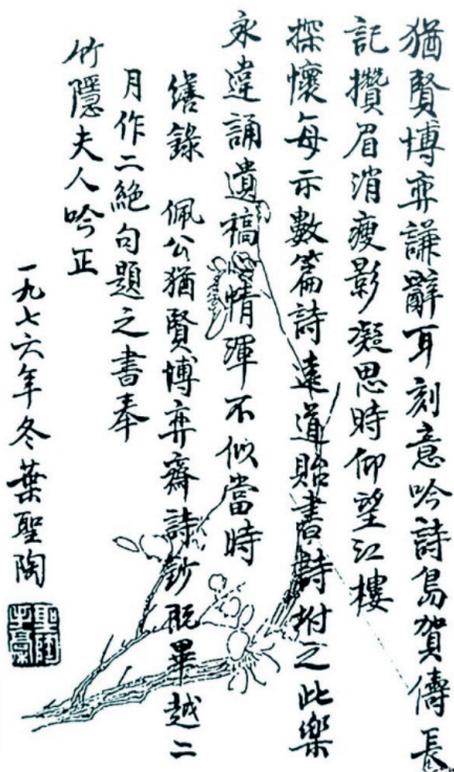
朱自清的幼女朱蓉隽出生于1940年11月，故可根据诗中“娇婴犹在乳”“赣鄂频捷音”等句推知该诗创作的时间。1941年2月，叶圣陶搬到了成都新西门外王家岗。望江楼在成都东门锦江南岸。故朱自清《赠圣陶》诗中有“烽火纵横忽一乡，锦城东西遥相望”的句子。1976年冬，叶圣陶作《佩公犹贤博弈斋诗钞既毕越二月作二绝句题之书奉竹隐夫人吟正》。诗中再次提到了望江楼：“犹贤博弈谦辞耳，刻意吟诗岛贺俦。长记攒眉消瘦影，凝思时仰望江楼。”此外，潘伯鹰曾作《闻佩文居报恩寺》诗二首。朱自清作《伯鹰有诗见及，次韵奉酬》和诗二首。1945年7月15日朱自清致浦江清信的末尾注有“成都外东宋公桥报恩寺”字样。

1941年2月13日，朱自清日记载：“房东托金太太转告，房租将涨为每月四十元。我们想迁往冯太太租赁已久而于最近放弃之茅屋，前往探视，惜已租出矣，只得接受房东之条件”。假期结束后，朱自清经乐山返回昆明，陈竹隐女士则带着孩子常住成都，后来又找到了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工作。1942年3月28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妻来信说，那位尼姑房东提出房租涨到五千元，如有人租用，妻须迁出。妻在等着瞧。我想这是我们所能采用的最聪明的策略。”

1941年10月30日，朱自清返回昆明。11月下旬，迁居北郊司家营61号。该址也是清华文科研究所所在地。正房楼下为办公室，楼上是图书室。左边厢房楼上住着闻一多一家。朱自清与浦江清等人住在



1940年7月，國立清華大學聘任聞一多代理中國文學系主任的聘函底稿。圖片來源：清華大學官方百度号



1976年冬，叶圣陶作《佩公犹贤博奕斋诗钞既毕越二月作二绝句题之书奉竹隐夫人吟正》手迹。图片来源：《叶圣陶七绝怀挚友》（徐强），载《鸭绿江》2023年第6期。引自“手稿研究”微信公众号2023年12月15日发布

门右边厢房楼上。不过，从1942年6月6日日记中“下午移床至新居”的记述推断，似乎又调换过住屋。

1943年9月12日的日记显示，当时的住处条件并不好。“这座房阴暗又吵杂，雨天尤甚。”朱自清会在有课时进城讲课，转日或隔日再从城里返回城外住所。他穿着赶马人用的毡披风步行进城上课应该就发生在居住司家营时期。

当时，朱自清在昆明城内唐家花园旧戏楼改造而成的清华教员宿舍还有一个住处。不回司家营时，便住在那里。据陈岱孙回忆：

我们还在昆师、农校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金先生和我们十几个同事租了城内翠湖旁边民房居住。但住了又不长的时间，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

次空袭中，中弹被毁。我们收拾余烬和另十来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同仁一起，迁往清华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门街唐家花园中的一座戏台，分据包厢，稍有修整，以为卧室。台下的池座，便成为我们的客厅和饭厅。金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李继侗先生、陈福田先生及我五个人合住在正对戏台的楼上正中的大包厢。幸运的是，我们在这戏台宿舍里住了五六年，直至日本投降，联大结束，不再受丧家之苦。

1943年7月，朱自清作为导师参加了云南省留美学员预备班在观音山举行的夏令营。夏令营由清华大学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负责。日间安排了参观海口造纸厂、五十三厂（军工厂）、听演讲、游庾园、逛观音香会、游泳、骑马、射击等活动。



清华园里的闻一多像。左，清华大礼堂西侧的闻一多像。2022年10月5日摄。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庭院内的闻一多像。2016年4月24日摄。右，蒙民伟人文楼一层大厅里的闻一多像。2024年3月9日摄。



1947年7月20日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会后，部分参会者在清华大礼堂前留影。2022年11月13日翻拍于清华大学“张祖道镜头下的清华”图片展。右起：余冠英、李广田、潘光旦、朱自清、吴晗、张奚若。张祖道摄。1948年7月15日，朱自清还抱病参加了闻一多遇害两周年纪念会。《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508页。

晚间则有座谈会、辩论会、英语讨论会、康乐会、男女山歌等内容。学生还负责出壁报。

1943年秋，由于路途遥远，身体多病，饮食方面存在诸多不便，朱自清萌生了常住城内的想法。和周围人相处不甚愉快更推动了他做出决断。

闻一多一家也在1944年搬回城里居住。1946年7月17日，闻一多遇害时，朱自清正在成都。8月18日，“出席闻一多和李公朴的追悼会，发表讲话，谈闻一多生平。”此前他已多次参加追悼闻一

多的活动，并作讲演。

西南联大时期，朱自清曾多次短暂赴重庆。1942年6月12日，朱自清飞往重庆参加会议。“五时三刻到，即投企孙处宿。”23日乘机返回昆明。1946年6月14日，朱自清去成都时也是在重庆候机。“仓卒赶至中华航空公司，又急忙至机场。等西康方面来飞机达三小时，晚宿于聚元村二十二号。”同年8月19日，又从成都经内江赴重庆。20日“傍晚抵重庆，宿于生生花园。”9月17日，“去宽仁医院。迁至中四路六十一号，暂住医院。”至23日上午出院。

抗战期间，在与萧公权的一首应和长诗《夏夜次公权韵》中，朱自清追忆了在清华园的美好时光：

自从移家入旧都，蕞尔丑类莫余侮。
名园暑夕清风生，促坐不劳挥玉麈。
澄明夜静独摊书，片语会心色飞舞。
窗外婀娜摇细竹，壁间窸窣鸣饥鼠。
解渴已办冰梅汤，沁人齿颊一丝馥。
平生知慕马少游，此情合入无双谱。
读倦开门自盘【林文】，高树微凉侵肺腑。
相逢不寐人两三，亹亹清谈忘夜午。

但真正重返清华园，还要等到抗战胜利一年之后。🌿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